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吗？

瞿倩红 卢 权

《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发表的刘丽同志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一文（以下简称“刘文”），提出了1922年发生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由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发动和领导的论点。这个论点是值得商榷的。对此，我想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就教于刘丽同志。

为了说明问题，在这里先概要地介绍一下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一些基本情况与特点：（一）拥有数万人之众的香港海员，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资本家经营的轮船上从事一些繁重、下贱的劳动，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工作条件恶劣，待遇十分低下，在经济上饱受资本家的剥削。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政治上“深受帝国主义压迫虐待而无路诉冤”^①。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压迫剥削日益加深，因此不断激起香港海员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外国资本家的反抗情绪。（二）海员们随船涉足于世界各个港口，见多闻广，容易受到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他们耳闻目睹俄国工人阶级举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沙皇的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经过；也看到了欧美各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了反抗压迫剥削，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而不断奋起斗争的情况，并深受鼓舞和影响，从中吸取了力量。（三）他们学习外国工人阶级的榜样，摒弃了过去行会帮口一类的组织，团结起来，成立了现代产业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以下简称香港海员工会），在世界革命潮流和国内工人罢工斗争影响和鼓舞下，为了改善经济待

① 苏兆征在全国第一次海员大会上的报告 1926年1月。

遇和反对政治压迫，香港海员工会在成立后不久毅然带领海员工人举行了罢工斗争。（四）香港海员大罢工不仅是为了反抗资本家的剥削，争取改善经济待遇，同时也是为了反抗香港英国当局的政治压迫。因此这次罢工既是一场经济斗争，同时也是一场反帝的政治斗争。（五）由于广大海员工人同仇敌忾，团结一心，坚持斗争，再加上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声援，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迫使香港英国当局在中国工人阶级面前屈服。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斗争，推动了国内工人罢工斗争的发展，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下面就一些问题与刘丽同志商榷。

一、关于孙中山与香港海员罢工。“刘文”认为关于孙中山和国民党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孙中山在罢工中“起决定作用”。其理由之一是“罢工的领导机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在孙中山等人发动下形成的，是经国民党广东政府注册的”（引文均引自“刘文”，下同）。我认为这个理由比较牵强，是经不起推敲的。

香港海员工会是在孙中山的关怀与支持下成立的，这是事实。但要注意：香港海员工会成立时，同时选举成立了海员工会理事会，以陈炳生为会长，林伟民等人为工会干事，作为香港海员工会的领导机构。此后香港海员的各种活动，都是在海员工会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独立进行的。孙中山不是香港海员工会的领导人，也不能说孙中山就等于是海员工会的领导人。香港海员工会所开展的各项活动，无需请示或决定于孙中山或国民党。香港海员工会与孙中山或国民党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隶属关系。这同样是历史的事实。

再者，香港海员工会的成立，与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两个历史事件，两者虽互有关系，但又不能等同起来。香港海员工会成立时虽然得到过孙中山的关注与支持，但能否由此再推论，把日后爆发的由香港海员工会领导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也说成是孙中山和

国民党所发动与领导的呢？！这当然是不能的。

二、关于联义社与香港海员罢工。“刘文”提出香港海员罢工是由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发动和领导的另一理由，在于“罢工是国民党的联义社支持”的，苏兆征、林伟民等是“主持罢工的国民党联义社的成员”，“他们是以国民党联义社成员的身份参加并领导了海员罢工”的。我认为这一说法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关于“联义社”的情况，“刘文”虽然作了一些介绍，但欠准确，有必要在这里再加以介绍和说明。“联义社”是一个由香港海员组成的团体，于1913年前后在孙中山的号召和关注下成立的。联义社的成立，一方面是为了谋海员本身的一些福利，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需要，而后者是主要的。但联义社仅仅是一个香港海员自己组织的群众团体，并不是国民党的组织，也不是国民党属下的一个分部。联义社的成员中，虽有不少人曾经是同盟会员或国民党员，但决不能因此就把联义社与国民党等同起来。硬把联义社说成是国民党的组织，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

当年曾亲身参加过联义社的老海员刘达潮曾就联义社的性质作过如下回忆说：在孙中山支持下，香港海员组织了联义社。联义社最初不是一个社团组织，而是一个宿舍的名称，后来活动增多了，才变成一个社团组织。最初的负责人为赵植芝、戴卓文等人。海员工人在联义社的组织下，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协助革命党人传递消息和运送军火^①。

邓中夏论述过联义社的性质，他说：“孙中山奔走革命流亡海外时，曾以乡谊关系与海洋轮船上之粤籍海员发生不少关系，以救国为号召，鼓吹海员组织团体，有所谓联义社、群益社等组织。这些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只是为了孙中山自己的目的。的确孙中山在南方几次军事行动，得到此等团体为孙中山秘

^① 刘达潮：《广东海员的战斗历程》，载《广东党史资料》，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密购买和运输军械。”^①

1958年台湾出版的《中国劳工运动史》（马超俊主编），也对联义社的性质作过如下论述：“民二（1913年）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国父避地日本，命党员邝石、赵植芝等将所组织的侨海联义会改组为联义社于横滨。专以团结各地华侨及华籍海员，吸引入社，加强革命工作。该社社员是以海员为众，故于海上交通运输，协助革命的贡献为多。后来国父为沟通各地，易于联系起见，乃派赵植芝等赴香港组织联义分社，又为香港海员最先组织工会的原因之一。”^②

从以上所引资料可见，联义社只是海员工人组成的社团，并不是国民党组织或国民党下面的分部。再者，“刘文”把联义社说成是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的“主持者”，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由于联义社本身是一个组织松散、无明确宗旨的团体，也就无法真正为广大香港海员谋利益，因此后来就渐渐为海员们所摒弃。在各国工人运动的鼓舞与影响下，香港海员终于成立了现代产业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这时联义社等社团虽仍然存在，但已徒具虚名，其活动实处于停顿。大量事实证明，1922年1月发生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绝不是联义社主持或领导的，也完全没有用过联义社的名义来领导罢工，而是在香港海员工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对此，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史实说明：作为香港海员工会的骨干人物苏兆征，在罢工爆发后，被选为香港海员工会直接领导下的省城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会长^③，具体组织领导罢工斗争的进行。不久，（海员工会）会长陈炳生因杀妻被捕，故先改选会长，然后开议，众推苏兆征为会长^④，由他继续领导罢工斗争。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② 载《中国劳工运动史》，第1编，第86页。

③ 上海《申报》1922年3月2日；另据邓中夏称：苏兆征当时担任“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

④ 上海《申报》1922年2月22日。

罢工期间，香港当局、资方与香港罢工海员进行谈判时，海员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在海员工会主持下选出来的。“（二月）七日，海员全体假座广州广西会馆开会，该会会长陈炳生主席……派全权代表四人赴港解决，并订要求条件九条，经全体一致赞同。”^①苏兆征原为四名谈判代表之一，后因兼任代会长，乃推林伟民代之^②。

罢工期间，香港英国当局宣布香港海员工会为非法，严加查禁。但是，罢工海员决不屈服于香港英国当局的淫威，在海员工会的带领下继续坚持斗争，终于逼使香港英国当局低头屈服，接受海员加资等合理要求，取消禁令。

由此可见，“刘文”把这次香港海员罢工说成是“国民党联义社主持”，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刘文”把“国民党联义社主持罢工”这个并不存在的事情再作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发动和领导海员罢工的理由之一，也就更加难以令人信服的了。

三、关于苏兆征、林伟民与香港海员罢工的关系。“刘文”认为香港海员罢工是国民党发动和领导的另一根据是：罢工主要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都是国民党党员，又是主持罢工的国民党联义社成员”，“他们是以国民党联义社成员的身分参加并领导了海员罢工，国民党的领导主要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我认为这个理由同样缺乏说服力。

苏兆征、林伟民早年确实都曾参加过同盟会和国民党，是孙中山的信徒，并曾积极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者的革命活动，被誉为“广东方面的活动分子”^③。但是，还必须同时指出这样的事实：辛亥革命以后，苏兆征与林伟民经过不断的实践，对于国民党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认识和态度，已经起了重大的变化。因此日后苏兆征、林伟民在领导香港海员罢工时，决

① 上海《申报》1922年2月13日。

② 上海《申报》1922年2月22日。

③ 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不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在他们身上并不能体现国民党的领导作用。在辛亥革命以后他们已渐渐发现不少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存在革命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看清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虚伪和骗人”^①，因此，当广东当局想拉拢他们为其效力时，他们“掉头不顾”^②，决心继续寻求真理和真正救国救民的道路。

另一方面，苏兆征、林伟民在不断实践中，却日益受到了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与鼓舞，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与欧美工人运动的发展，使他们眼界大开。他们“博览当时新文化的书籍与报纸，很虚心地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③。他们“深信只有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完成人类的彻底解放”^④。他们有了革命理论的指导，对社会和革命的认识大有长进，便从旧民主主义思想中解脱出来，展现了新民主主义的面貌。他们还学习俄国与欧美工人阶级的榜样，联络广大海员工人，摆脱封建行会的羁绊，“组织工会，以谋解放”^⑤，成立了现代产业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毅然带领广大香港海员起来进行罢工斗争。

对于这场矛头直接指向香港英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震惊中外的海员罢工斗争，当时国民党能否担当起领导责任，这里且不展开讨论。但我们至今确实仍未发现孙中山或者国民党就如何发动和领导这场罢工斗争公开发表过任何宣言、文件或言论。我们至今也无法找到任何关于苏兆征、林伟民在领导罢工过程中如何具体执行国民党方面的任何指示，或如何体现国民党的领导作用的任何资料。“刘文”对于上述两个方面也未能披露任何一点具体史料。如果仅仅因为苏兆征、林伟民曾经是国民党人，就简单推论说国民党的领导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这实在是不能令人

① 文虎：《苏兆征同志传》，载中华全国总工会编《苏兆征纪念册》1930年。

② 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③④ 文虎：《苏兆征同志传》。

⑤ 苏兆征在全国第一次海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1月。

信服的。

历史的事实倒是令人信服地表明：在领导香港海员罢工斗争实践中，苏兆征、林伟民却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对于这次海员罢工斗争的真诚支持与指导作用，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一心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革命党，因而在思想上更倾向共产党，决心跟随共产党干革命，正如“刘文”引述邓中夏说的一句话：苏兆征在罢工过程中，“当时到处找共产党”，只是找不到罢了。因此，把苏兆征、林伟民说成是以国民党联义社成员身份参加并领导了罢工，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国民党的领导作用，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四、关于陈炯明及其控制的广东政府与香港海员罢工。“刘文”认为“罢工的活动经费，大都来自国民党方面”，罢工期间由陈炯明主持的国民党广东政府“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国民党发动和领导这次香港海员罢工的理由之一。对此，我认为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

香港海员罢工爆发时，孙中山不在广州，正在广西桂林筹划北伐事宜。当时广东政府置于粤系军阀陈炯明控制之下。陈炯明是个两面派，一面虚伪地表示忠于孙中山，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被委任为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等要职；同时又极力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阻挠破坏孙中山的北伐大业。为了达到反对孙中山、统治广东的反革命目的，当时陈炯明正极力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相勾结，并企图借助英帝国主义的扶持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因此，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下，把这一场有数万海员工人参加的大罢工，说成是陈炯明控制的国民党广东政府所发动和领导的并起了重要作用，实是不能令人置信。

诚然，香港海员罢工过程中，确实得到了广州各阶层群众的热烈声援和广东政府的重要支持，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支持。但就陈炯明来说，他之所以命令广东政府给予罢工海员以经济上的援助，除了由于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支援罢工海员的强烈情绪的推动外，还出于个人方面的考虑。陈炯明深知孙中山当时在香港

海员中的广泛影响，他正是想借支持罢工来抬高自己的威望，捞取政治资本，来排斥孙中山在海员中的影响；同时他又借此以增加其作为与英国当局勾结过程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陈炯明在表示支持海员罢工的同时，并不敢过分得罪于英国当局；后来在英当局的压力下，便想草草结束罢工。陈炯明及其控制的广东政府在罢工中的“重要作用”，正在于想极力左右罢工斗争，使之顺着他的轨道进行。

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史实。由于罢工的举行，给予香港以沉重的打击，英国当局派人到广州与陈炯明密商，要他出面干预罢工，后又派华民副政务司话雅伦来省，“晋谒陈省长，请为第二次之调处”^①。英国当局还取得陈炯明同意，派船前往广州搜购粮食返港^②。但是他们这些活动，受到了罢工海员和广州人民的抵制，不能得逞。2月间，罢工海员与资方代表进行谈判时，陈炯明指派陆敬科作为广东政府方面代表，以便从中左右谈判。在英方压力下，他急于解决罢工，召见罢工领导人苏兆征，要他接受资方提出的按原薪加二成半的条件，“谓海员倘对于此数如可照允，即可解决”，并表示“若海员开大会，省长可到场解说。但是苏兆征坚决捍卫海员利益，明确表示“此数与海员提出要求之数相差尚远”^③，抵制了陈炯明的干预。3月4日，“沙田惨案”发生后，中国工人积极酝酿进一步扩大罢工，以抗议英帝国主义的罪行。“英人方面急电（陈炯明）省长请设法阻止”^④。陈炯明当即进行干预，“以香港罢工潮正在调停进行中，该工人等应静候解决为是”^⑤。沙面工人的斗争因而未能实现。

对于陈炯明在罢工中所采取的一系列两面手法，罢工领导人苏兆征等是十分清楚的，因而巧妙地对付之，一方面通过陈炯明

① 《新闻报》1922年2月5日。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2月2日。

③ 上海《申报》1922年3月7日。

④ 上海《申报》1922年3月15日。

⑤ 上海《申报》1922年3月15日。

取得广东政府的经济援助，把广州作为坚持罢工斗争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又始终不被利用，成为他的政争的工具。

五、关于马林与香港海员罢工。“刘文”还引述了马林的一些言论，作为香港海员罢工是国民党所发动和领导的佐证之一。事实上，马林的说法是不足为据的。

香港海员罢工期间，马林正在中国，这是事实。但必须指出，马林对于香港海员罢工的经过是缺乏详细的了解和认真的研究的。因此他对于国民党与香港海员罢工的关系问题的论述，也就同时存在着各种说法。在某些场合，他的确说过“罢工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这样的话。但在另一些场合，他又同时说过，国民党领袖，“为他们提供活动场所并以各种方式支持海员的斗争”^①，“罢工工人得到了国民党的大力支持”^②，“民族主义政党（这时在南方组织了孙中山为首的政府）声援罢工的海员，全力支持海员的斗争”^③。我们知道，“支持”与“领导”两词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互相划一等号。“刘文”认为马林的“记述还是可信的”。那么马林一时又说国民党领导了罢工，一时又说国民党支持了罢工，这两种不同的说法，究竟那一个更“可信”呢？！

还必须指出，马林当时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是明显地带有偏见的。具体地说，一方面他对于当时的国民党作出过高的估计，夸大了国民党在当时的作用，不恰当地把国民党在南方的革命活动看作是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另一方面，他却又贬低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对其作出不符合实际的指责。正如“刘文”中引述马林抨击中国共产党的一段话：“广州的共产主义团体却不和罢工工人联系，也不支持罢工。”马林这一指责显然是无视事实，带有偏见的。

① 马林：《中国南方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1922年）。

② 马林：《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1922年9月）。

③ 马林：《中国铁路工人的罢工》（1923年3月）。

事实上，当时广东地区共产党组织虽成立不久，人数也很少，但当海员罢工发生后，他们却是全力以赴地支持香港海员罢工斗争。当时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便清楚指出：“香港海员罢工时，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招待及演讲，以共产党名义散传单三千份。”^④广东党组织时刻关注着这一斗争的进程。广东党主办的《群报》和团组织主办的《青年周刊》，经常及时地报道关于香港海员罢工进行情况，对罢工斗争表示热烈支持，还及时发表一些起指导性作用的评论，引导海员罢工朝正确方向发展。中共广东党支部在罢工期间还特意公开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的文告，表示“本党以海员同志们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能力，为之后援。”这对于海员罢工斗争的进行，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马林之所以无视上述事实，不是出于偏见，就是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

总之，1922年发生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否由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发动和领导的，这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但“刘文”以列举的一些情况，来作为国民党发动和领导了海员罢工的理由，则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不能苟同。

我的看法是：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在当时国内外革命潮流的影响和鼓舞下，由苏兆征、林伟民为骨干的香港海员工会自己发动和领导的。罢工斗争在进行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热烈声援，也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重要支持（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同时也得到了共产党方面的大力支持与指导，经过全体罢工海员团结一心、坚持不懈的斗争，罢工终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④ 《中共中央执委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